

# 「階級」與「民族」的糾結

## ——中國、朝鮮的近代史書寫

• 趙慶雲

**摘要：**文革前的「十七年」(1949-1966)間，中國、朝鮮儘管共享同一種意識形態，但即便處於蜜月時期，兩國對諸如中日甲午戰爭、開化黨、甲申政變等近代歷史問題的記述和評價，仍或隱或顯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中國史家雖然力圖以階級話語來化解與朝鮮的歷史恩怨，然而在敘述與朝鮮相關的近代史事時，階級話語與民族情感難免衝突抵牾，史家乃不免糾結於究竟以「階級」還是以「民族」為本位。本文認為，「十七年」間的近代史書寫，階級話語在意識形態中一度居於強勢地位，唯有「民族」話語能對趨向極端化的「階級」話語有所制衡。學界多以「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衝突作為梳理「十七年」史學思潮的主脈絡。但若深究一層，正是對民族國家主體價值的肯定，為「歷史主義」思潮提供了理論與現實支持。

**關鍵詞：**國際主義 階級 民族 中朝關係 近代史書寫

美國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有言：「現代社會的歷史意識無可爭辯地為民族國家所支配」，「歷史研究的主題可以不斷翻新，如王權、國家、階級、個人、身份認同群體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參照系總是民族。」<sup>①</sup>近年來，與洶湧的全球化趨勢相應，企求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史觀」興盛一時<sup>②</sup>。跨越國境的歷史認知也吸引着諸多史家投身實踐<sup>③</sup>。然而，正如中國學者俞可平所指出，「在可見的將來，民族國家仍將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仍將是基本的政治標識。」<sup>④</sup>

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具有全球視野，將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理論置於其理論體系的統率地位，以階級鬥爭來統攬民族問題，對民族主

\* 本文為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1949-1966)」(項目批准號為12CZS005)的階段性成果。

義持否定、批判態度，着力提倡打破民族國家界限的國際主義。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解中，馬列主義甚至「不能帶愛國的色彩」，而只應具有「萬國一致的階級色彩」<sup>⑤</sup>。1949年以後，隨着民族國家建立，由在野到在朝的身份轉換，使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中國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日益顯現。這種矛盾體現於政治、外交各個領域，也在史家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書寫中彰顯出來。

在1949至1966年(即所謂「十七年」)間，中國和朝鮮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由於山水相鄰，在歷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兩國有緊密關聯，兩國歷史書寫的很多部分都無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方。朝鮮史學界對近代歷史的敘述模式與價值取向同中國多所相似，如均對其近代統治階級予以否定和批判，來論證本國共產革命的合理性及現政權的合法性。但即便是處於蜜月時期，中朝之間對於中國近代史事的認識，仍或隱或顯地存在着難以彌合的分歧。

## 一 中、朝史事認知之分歧

中朝兩國在歷史認識上的分歧，根本而言，在於其各自作為民族國家的主體立場根深蒂固，並不因意識形態上反對「民族主義」、弘揚「國際主義」就可輕易得以消弭。

1963年6月28日，周恩來在接見朝鮮科學院代表團的談話中，對於以往中國史家提出批評<sup>⑥</sup>：

許多人都是以大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觀點來寫歷史，因此，許多問題寫得不公道。……〔中國〕欺侮你們，侵略你們的時候多。中國歷史學家必須承認這個事實。……這些都是歷史的痕迹，都過去了。這些事情，不是我們負責任的，是祖宗的事。當然只能承認這個現狀。……中國這個大國沙文主義，在封建時代是相當嚴重的。人家給他送禮，他叫進貢；人家派一個使節來同你見了面，彼此搞好邦交，他就說是來朝見的；雙方打完仗，議和了，他就說你是臣服了；自稱為天朝、上邦，這就是不平等的。都是歷史學家筆底的錯誤。我們要把它更正過來。

所以，我很希望你們科學院幾位懂漢文的歷史學家，來共同研究中朝關係史的問題，攻我們一下。因為，他們一讀那些書，就不好受，就好發現問題。我們自己讀，常常不注意，就忽略過去了。比如戲劇裏有一個薛仁貴，唐朝人，他就是征東打你們的，侵略你們的。我們的戲劇中就崇拜他。現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你們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許再演，要就是對這個戲劇批判才行。

還有對越南，中國有個英雄叫馬援，伏波將軍，征越南，人家二才女英勇抗擊失敗後投河自盡，還把腦袋割下來送到洛陽。我去越南發現了，去二才女廟獻了花，批判馬援。我們歷史上對馬援是稱道備至的。

現在，請你們懂漢文的歷史學家來中國，或我們去，共同研究歷史關係，這對我們，對你們，都有好處。寫出的歷史書籍也可更全面了。

中國和朝鮮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兩國歷史書寫的很多部分都無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方。中朝之間在歷史認識上的分歧，在於其各自作為民族國家的主體立場根深蒂固，並不因意識形態上反對「民族主義」、弘揚「國際主義」就可輕易得以消弭。

周恩來這一講話有其背景。當時中蘇同盟破裂，雙方互相攻擊，而朝鮮勞動黨對中共積極響應，中朝兩黨兩國關係尤為緊密。周的這番話無疑有示好之意⑦。隨後，中國和朝鮮更有共組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之實際舉措⑧。

周恩來所強調的國際主義立場，成為當時歷史敘述與詮釋的基調。在「中朝友好」的壓力之下，史學界特別注意顧及朝鮮的民族情感。例如，陳寅恪所著《論〈再生緣〉》，因其中述及元朝皇帝「打高麗，朝鮮方面有意見」，而被禁止出版。而且，周恩來更親自過問此事，要求中止討論《再生緣》，以免傷害中朝友誼⑨。民國時期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並不諱言清帝國與朝鮮、越南等國的宗藩關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朝貢體系有較詳細的論述⑩。但在1949年後馬克思主義史家的通論性著作中，對朝、越與清王朝的藩屬關係這一歷史事實多避而不談，即便是譯著也有這種避諱⑪。這一避諱雖未見明文規定，無形中卻對史家有着相當強的約束力。如范文瀾所著《中國近代史》對藩屬關係無一語交代，因此在敘述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時不免顯得脈絡不清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編寫的《中國史稿》第四冊，對此則以「清朝統治者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之間存在着一種封建的不平等關係」一語帶過⑬。而王啟民等編的《亞洲各國近代史講義》所敘述的越南、朝鮮近代史，幾乎完全抹除了清王朝的影子⑭。這種迴避藩屬問題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編纂中仍有所延續⑮。

作為近代以來備受欺凌的小國，朝鮮獲得獨立後，其作為民族國家的主體意識愈益強化。朝鮮歷史學界一直強調對「事大主義」（사대주의）的批判。所謂「事大主義」，是指1392至1895年朝鮮王朝對中國明朝和清朝稱臣納貢、積極效仿的政策。朝鮮學者寫道：「事大主義是抹殺民族自主性和自負心，使人民變成毫無志氣的奴隸的最反動的思想毒素」；「事大主義者完全閹割了我國人民擊潰外來侵略者的侵略，維護國家的獨立，光輝地繼承民族文化的燦爛的主動性，以充滿着對大陸統治者的毫無根源的讚美、追隨、奉承等的複雜的記錄替代了歷史。這裏絲毫也沒有民族自豪感和自負心。……應該揭露事大主義歷史家的反動面目，從民族自主性和人民的立場出發重新敘述我國歷史。」⑯另有文章說：「事大主義是剝削階級的統治思想，……阻礙了民族自主思想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發展，在今天可能直接變成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溫牀。」⑰

回溯到遠古史，朝鮮史學界也極重視對「箕子東來說」（기자동래설）的批判。所謂「箕子東來說」，是指商朝的遺臣箕子率商朝遺民到朝鮮半島建立「箕氏侯國」，並得到周朝的承認而成為諸侯。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56年的工作計劃中，將批判「箕子東來說」作為重要課題⑱；1961年6月21日，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考古學及民俗學研究所、古典研究所聯名召開「所謂箕子東來說的虛妄性問題」的討論會。與會者針對中國史著《史記》、《漢書》、《三國志》有關「箕子東來」的記載加以反駁⑲。

在反「事大主義」的「主體思想」指導之下，朝鮮有關近代史事的敘述自然更為敏感。朝鮮官方學術刊物《歷史科學》1958年第1、2期所刊載的論文〈日本資本主義對朝鮮的侵略和朝中關係〉，因為對滿清王朝有所肯定，即被批判為「缺乏主體性」、「是對歷史事實的主觀主義的歪曲，也是教條主義的表現」⑳。

周恩來所強調的國際主義立場，成為當時歷史敘述與詮釋的基調。在「中朝友好」的壓力之下，史學界特別注意顧及朝鮮的民族情感。1949年後馬克思主義史家的通論性著作中，對朝、越與清王朝的藩屬關係多避而不談。

在國際主義與民族國家立場的糾結之下，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認識與表述，朝鮮與中國的史學界也不免存在分歧。1963年前後，社科院近代史所組織人員整理翻譯了一批朝鮮史學界對於中朝近代歷史認識問題的資料。資料編譯者的總體判斷是<sup>①</sup>：

中日甲午戰爭的問題，在朝鮮史的著作中都談得很少。至於甲午戰爭時期清朝統治者與朝鮮李朝統治者的關係，近年來的朝鮮史著作似乎更是避而不談。但是，朝鮮史學界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在他們關於1885年以後朝鮮遭受外來侵略的狀況的論述中，以及關於1894年朝鮮爆發農民戰爭後中日分別出兵的問題的論述中，都表現了出來。簡單說來，他們都認為中日兩國是在爭奪朝鮮，是在排擠對方、加強自己的。這似乎是朝鮮史學界一致的看法。

具體來看，1961年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寫、出版的具有權威性的《朝鮮近代革命運動史》明確表示：「這時（指1885年以後）清勢力對朝鮮的影響已不如1882-1884年，但仍舊操縱着守舊派官僚，侵犯我國主權，它仍舊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最主要的外國侵略勢力。清朝統治者之關心朝鮮，其目的是企圖保衛自己，把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以朝鮮為跳板直接威脅中國心臟的危險拒之於門外，但同時也掩蓋不了它妄想以侵略朝鮮來挽回它在國內外日益低落的威信這一企圖」；「清政府利用朝鮮統治者要求出兵的機會，野心畢露立即命令出動北洋軍的陸海軍，企圖加強在朝鮮的侵略勢力」；「我國變成了中日兩國的戰場」<sup>②</sup>。

朝鮮學者李清源所著《朝鮮近代史》則如此敘述：「清廷雖然從朝鮮撤退了軍隊，但是並不想放棄加強自己在朝鮮的勢力和維持朝鮮對『天朝』的藩屬關係的企圖。尤其是在1884年政治陰謀失敗以後，清廷駐朝鮮代表的地位已大為改善，而他們得有機會更加積極地過問朝鮮事務的時候，清廷對上述企圖就更加感到興趣了。……每一個強國都力圖強迫朝鮮接受自己的影響，在朝鮮確立自己的統治。這時候朝鮮朝士集團中各個政治派別的出現，只是這種外力鬥爭的反映……無論這些政治派別的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它們都做了外國的走狗和外國勢力在朝鮮的嚮導。」<sup>③</sup>

此外，在朝鮮的官方學術刊物中，諸如「在人民反抗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封建統治者更進一步走上投合滿清勢力的道路。滿清政府正是利用朝鮮封建統治者的弱點，操縱守舊派，企圖擴大他們對朝鮮的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滿清統治者企圖利用這個機會暫時挽回窮途末路的侵略勢力」<sup>④</sup>，這一類的表述也所在多見。

中國史家力圖克服「大民族主義」，但與朝鮮史家的一些認識仍不免存在分歧。以《中國史稿》第四冊為例，雖然強調貫徹階級分析，對清政府多有惡評，但在敘述中日甲午之戰時，民族國家立場佔了上風，將這場戰爭視為清軍和朝鮮人民一道同兇狠蠻橫的日本侵略者展開的正義之戰：「中國為了阻止日本侵略朝鮮，為了自衛而戰，是反侵略的正義的戰爭。」該書對清軍將領左寶貴、鄧世昌稱頌有加，並特別強調：「朝鮮人民熱情歡迎和支持中國軍隊在朝鮮的抗日鬥

中國史家力圖克服「大民族主義」，但與朝鮮史家的一些認識仍不免存在分歧。例如《中國史稿》在敘述中日甲午之戰時，民族國家立場佔了上風，將這場戰爭視為清軍和朝鮮人民同兇狠蠻橫的日本侵略者展開的正義之戰。

爭。中國援軍開到平壤時，當地人民夾道歡迎，爭獻茶漿慰勞。由成歡驛敗退到平壤的軍隊，沿途人民自動讓出房屋，供應食物，熱情接待。平壤戰敗後，朝鮮人民意圖掩護受傷的中國士兵和軍官從朝鮮安全歸國。流落在朝鮮的中國士兵，積極參加朝鮮人民在全羅一帶的抗日鬥爭。」<sup>26</sup>這一敘述同朝鮮史家的看法頗有差異。

## 二 中、朝歷史認知衝突的個案

1960年代初，為共同對抗蘇聯，中朝關係十分密切，史學界也緊密配合。中國大陸官方權威史學刊物《歷史研究》1963年第5期刊登朝鮮學者金錫亨（時為朝鮮社會科學院院長）、金熙一、孫英鍾撰寫的〈關於《世界通史》（蘇聯科學院編）有關朝鮮的敘述的嚴重錯誤〉，向此前一直具有神聖地位的蘇聯史學公開挑戰。但金錫亨等人之文，將甲申政變時的清王朝中國與日本等量齊觀，甚至視中國為更反動的敵人，並認為朝鮮開化黨利用日本完成了反對清王朝這一愛國的政治活動<sup>26</sup>。1963年，《中國史稿》第四冊（1962年初版）的修訂書稿提交人民出版社，出版社認為書稿涉及朝鮮的部分——特別是有關「開化黨」、「甲申政變」的內容——與朝鮮學者金錫亨等人觀點相抵觸，乃致函《歷史研究》主編尹達和《中國史稿》編纂工作領導人劉大年，要求修改<sup>27</sup>。

對於朝鮮的「開化黨」，此前中共史家如范文瀾所著的《中國近代史》表述為：「日本扶植朝鮮失意官僚組織所謂開化黨」，「開化黨乘機作亂，勾結日兵奪取政權，清軍得朝鮮人民援助，擊敗日兵，亂黨逃往日本」<sup>28</sup>。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亞洲各國史教研室主任王輯五所編的《亞洲各國史綱要》受范著影響，稱「開化黨」是日本「侵略朝鮮的爪牙」<sup>29</sup>。這一陳述在朝鮮史家看來難以接受。朝鮮《歷史科學》1955年第11、12期，1956年第1期連續發表李拿英的〈一八八四年甲申政變的研究〉，強調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作為朝鮮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進步意義，對中國史家的看法提出尖銳批評。他的觀點得到朝鮮史學界普遍贊同<sup>30</sup>。朝鮮學者的觀點亦影響到中國學者的看法。如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李啟烈即以朝鮮學界的主流觀點為依據，對《亞洲各國史綱要》有關朝鮮的部分提出批評<sup>31</sup>。

《中國史稿》第四冊初版時對「甲申政變」表述為：「1884年12月，日本侵略者利用朝鮮人民要求擺脫清政府羈絆的正當的願望，製造了一次流血政變——『甲申政變』。日本企圖扶植朝鮮的親日勢力（開化黨）奪取政權，為日本在朝鮮擴充侵略勢力提供方便。」<sup>32</sup>1963年提交的修訂書稿中，實際已部分吸收朝鮮學界的觀點，對「甲申政變」表述為：「這個政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人民要求改革內政和擺脫清政府羈絆的正當願望」；「政變的發動者對日本侵略勢力抱有幻想」<sup>33</sup>。這一表述無疑對「甲申政變」被日本利用抑或利用日本，作了淡化和模糊化處理。

為此，社科院近代史所曾開會討論，並由劉大年於1963年11月20日將回覆意見寄尹達，並轉中宣部教育處長吳寄寒，表示<sup>34</sup>：

《中國史稿》初版時對「甲申政變」表述為日本侵略者利用朝鮮人民要求擺脫清政府羈絆的正當的願望而製造的政變。修訂書稿中的表述對「甲申政變」被日本利用抑或利用日本，作了淡化和模糊化處理。

1949年以前，中共居於在野地位，且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因而在使用階級話語時較少顧忌其與民族國家利益之間存在衝突。中共建立全國性政權後，身兼階級與民族國家利益代言者的雙重身份，階級本位與民族本位的扞格也就難以避免。

金錫亨等同志的文章是批判修正主義對朝鮮歷史的歪曲的。我們要堅持原則性，堅決支持他們的反修鬥爭。……但是，我們認為，在這個原則下，根據歷史事實，力求說得平穩可靠些，並不需要逐字逐句照抄別人的說法。朝鮮同志強調要有主體思想，這種精神很值得我們共同學習。

關於中日甲午戰爭。金錫亨等同志的文章以較多的篇幅談到甲申政變，但沒有一個字涉及中日甲午戰爭。人民出版社信上說，看了金錫亨等同志的文章，認為中國史稿關於中日甲午戰爭部分也還有一些問題，特別對中國史稿強調戰爭期間朝鮮人民熱情支持中國軍隊抗日有不同意見。中國史稿鄭重敘述了中朝人民共同反對日本的侵略，宣傳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第一、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第二，我們認為這不但沒有害處，相反，它對中朝人民團結、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會有好處。因此，關於甲申政變和中日甲午戰爭，照現在的寫法是可以的，並且是應當這樣寫的。

至於如何處理，建議在下面的三個辦法中選擇一個辦法：1、維持現狀不作改動。2、請教材辦公室召集有關同志，開會討論，提出修改意見。3、由中宣部領導同志決定何者保留，何者修改或刪去。

劉大年此處實際上迴避了中朝兩國史家觀點的分歧，而只是委婉地表示我們也應有「主體思想」。此事最後經中宣部請示康生、周揚，決定：「可以照這次的修訂稿付印。但在送給朝鮮時，須由送書的單位出面寫一信，說明此係初稿，是供高等學校教學參考用的，寫得不成熟，還要作大的修改，書中有些論述可能有錯誤，請朝鮮同志提意見，以便訂正。」<sup>⑤</sup>

因金錫亨等人之文主要論及「甲申政變」，《中國史稿》第四冊於1965年重印時，為免影響中朝友誼，還是略去了「甲申政變」之名，僅言：「1884年12月，朝鮮發生流血政變」，但將「政變的發動者對日本侵略勢力抱有幻想」之表述予以保留<sup>⑥</sup>。

### 三 「階級」與「民族」的糾結

民族主義植根於民族認同，以民族為本位；而馬列理論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旗幟，其核心是階級認同，以階級為本位。二者無疑存在內在的衝突。民族認同自然而生；階級認同卻需要不斷去啟發、引導才能奏效。階級認同與民族認同發生衝突時，民族認同往往具有更持久堅韌的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階級鬥爭理論統合民族主義的傾向，被列寧、斯大林推進為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否定。斯大林直截了當地表示：「民族主義——這是資產階級最後的障地；要徹底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把它打出這個障地。」<sup>⑦</sup>

中共對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sup>⑧</sup>。若論及這些理念，則以1949年建國為界經歷了一個根本轉變。1949年以前，中共居於在野地位，且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因而在使用階級話語時較少顧忌其與民族

國家利益之間存在衝突。1949年中共建立全國性政權，身兼階級與民族國家利益代言者的雙重身份，階級本位與民族本位的扞格也就難以避免。

為了建立、鞏固與蘇聯的同盟關係，以國際主義抑制民族主義成為中共在建國之初的基本態度，且由掌管意識形態的劉少奇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做了權威的理論闡述。劉少奇以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截然對立起來，並將民族問題從屬於階級鬥爭：「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sup>③</sup>這句話作為權威論斷被廣為引用。「民族主義」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已居於政治不正確之列，天然具有貶義色彩，人們遂以「愛國主義」替代，表達着相近的意涵<sup>④</sup>。吳玉章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諄諄告誡：研究歷史「要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sup>⑤</sup>。此後，不少史家紛紛撰文論述歷史研究教學要貫徹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在史學刊物出現的頻率，甚至高過「國際主義」。

在建國之初的意識形態中，民族主義處於被壓制的劣勢狀態。如前文所論，中國史家在敘述近代史時，縱然力圖以階級話語來化解與朝鮮這一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歷史恩怨，但也無法擺脫民族國家的立場。「階級」與「民族」交織，而以「階級」為本位還是以「民族」為本位，令史家在書寫中國近代史時甚感糾結。在敘述朝鮮相關的史事時，階級話語與民族情感難免衝突抵牾。

此時，對於清王朝的看法也隱然發生改變。若以「階級」為本位，則滿清王朝自然屬於腐朽至極的「封建勢力」而應被批判；但是，若以「民族國家」為本位，則清王朝開疆拓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奠定基礎，則應予以肯定性評價。周恩來在1963年接見朝鮮科學院代表團的談話側重批評中國史家的大民族主義，但也指出「滿族對中國有貢獻，把中國版圖搞得很大」<sup>⑥</sup>。

建國初期，在史家筆下，「清政府就是腐敗的代名詞，是無能的代名詞」，對「清朝歷史一片罵倒」<sup>⑦</sup>。但1961年劉大年發表〈論康熙〉一文提出：「康熙統治期間，中國形成了一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相當堅強統一的封建國家。」<sup>⑧</sup>李澤厚認為此文「符合當時的聖意」<sup>⑨</sup>。實則不僅劉大年如此，其他不少史家也紛紛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論述。范文瀾受「夷夏之辨」影響頗深，所著《中國近代史》着力批判滿清統治，他在1950年還認為「大清帝國是民族的牢獄」<sup>⑩</sup>，但到1962年卻認為：「對清朝的看法，必須改變辛亥革命以前的觀點。今天對清朝應重新評價。清朝建立了比明朝更大的國家，事實上廢除了長城，這是很大的貢獻。」<sup>⑪</sup>

中國史家在敘述近代史時，縱然力圖以階級話語來化解與朝鮮的歷史恩怨，但也無法擺脫民族國家的立場。「階級」與「民族」交織，而以「階級」為本位還是以「民族」為本位，令史家在書寫中國近代史時甚感糾結，階級話語與民族情感難免衝突抵牾。

## 四 結語

因毛澤東在建國後繼續貫徹革命邏輯，繃緊階級鬥爭之弦；而且在中共的革命藍圖中，中國革命與國際主義的世界共產革命互為一體<sup>⑫</sup>，就其意識形態而論，中共從在野的造反革命者向民族國家建設者的轉變頗有曲折，這也導致「階級」與「民族」的糾葛更為複雜。建國後的「十七年」間，意識形態中階級話語一度居於強勢地位。在近代史的書寫中，唯有「民族」話語能對趨向極端化的「階級」

在近代史的書寫中，唯有「民族」話語能對趨向極端化的「階級」話語有所制衡。學界多以「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衝突作為梳理「十七年」史學思潮的主脈絡。但若深究一層，正是對民族國家主體價值的肯定，為「歷史主義」思潮提供了理論與現實支持。

改革開放以後，隨着時代主題由革命向建設的轉換，「階級」話語日益被冷落。中國近代史的敘述結構也發生了深刻改變，如今我們自然已能超越所謂「階級立場」的局限。但是，正如有學者根據自身研究經驗指出，歷史研究中民族「情感」（民族大義）往往比「政治正確」更難超越<sup>⑥</sup>，則當年史家在「階級」與「民族」之間的困擾糾結，仍可以為今天提供某種參照。

改革開放以後，隨着時代主題由革命向建設的轉換，「階級」話語日益被冷落。中國近代史的敘述結構也發生了深刻改變，如今我們自然已能超越所謂「階級立場」的局限。但是，正如有學者根據自身研究經驗指出，歷史研究中民族「情感」（民族大義）往往比「政治正確」更難超越<sup>⑥</sup>，則當年史家在「階級」與「民族」之間的困擾糾結，仍可以為今天提供某種參照。

### 註釋

- ①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28。
- ② 參見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頁242-59。
- ③ 如中日韓三國共同歷史編纂委員會：《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即代表了此一努力方向。
- ④ 俞可平：〈全球化與新的思維向度和觀察角度〉，《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1期，頁8。
- ⑤ 〈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8月13日)，載《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54。
- ⑥④ 〈周恩來總理談中朝關係〉，《外事工作通報》，1963年第10期，頁2-4；3。
- ⑦ 毛澤東也在1950年6月27日接見赴越南的顧問團成員時說：「我們的老祖宗對人家不起，侵略過人家。大概是漢朝吧，東漢時期，有個大將軍叫馬援的，帶領兵將把人家征服了。」陳志斌、孫曉：《開國第一戰：抗法援越決勝奠邊府揭秘》(北京：華齡出版社，1993)，頁47。不過毛此後又對馬援多有稱讚，且建議高級幹部讀《馬援傳》。可見對於歷史認知，中共領袖毛澤東亦體現出「階級」與「民族」的內在緊張。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190。
- ⑧ 參見孫秉根：〈關於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的一些情況回憶〉，載馬大正主編：《東北邊疆歷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內部資料，2003)，頁104-14。
- ⑨ 黎之：〈回憶與思考——從一月三日會議到六月批示〉，《新文學史料》，1998年第3期，頁110；穆欣：〈郭沫若考證《再生緣》〉，《世紀》，2006年第5期，頁36。
- ⑩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57-58。
- ⑪ 朝鮮學者白南雲等著，馬超群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朝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一書雖有對外關係的專節，但對朝鮮李朝與滿清中國的關係避而不談。
- ⑫⑫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頁226-38、241-71；246。
- ⑬⑬ 劉大年主編：《中國史稿》，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90；98。
- ⑭ 王啟民等編：《亞洲各國近代史講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 ⑮ 例如近期由中宣部組織近代史專家編寫的、作為高校歷史專業教材的《中國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⑯ 金永淑：〈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愛國文化啟蒙運動〉，《歷史科學》(朝鮮)，1961年第1期。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有關朝鮮歷史認識的資料》(內部資料)，頁25。
- ⑰ 〈保衛歷史科學的黨性原則〉，《歷史科學》(朝鮮)，1962年第3期。引自《有關朝鮮歷史認識的資料》，頁37。
- ⑱⑱ 李啟烈：〈朝鮮科學院歷史科學研究動態〉，《歷史研究》，1957年第12期，頁107；108。

- ⑲ 〈就所謂「箕子東來說」的虛妄性問題進行的科學討論會〉，《歷史科學》(朝鮮)，1961年第4期。引自《有關朝鮮歷史認識的資料》，頁43。
- ⑳ 〈站在朝鮮人民的立場上、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研究和分析我國的歷史〉，《歷史科學》(朝鮮)，1961年第1期。引自《有關朝鮮歷史認識的資料》，頁43。
- 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朝鮮歷史學界對有關中日甲午戰爭的一些問題的看法·按語》(內部資料)，頁1-2。
- ㉒ 《朝鮮近代革命運動史》。引自《有關朝鮮歷史認識的資料》，頁56。
- ㉓ 李清源著，丁則良、夏禹文譯：《朝鮮近代史》(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72、92。
- ㉔ 卓炳萊：〈甲午更張的歷史前提條件〉，《歷史科學》(朝鮮)，1963年第6期。引自《有關朝鮮歷史認識的資料》，頁75。
- ㉕ 《中國史稿》，第四冊，頁112。此書實際主持編寫者劉大年在編寫會議上反覆強調，寫中日、中法戰爭時，「不要使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參見《內部簡訊》，1961年第2期，頁3。
- ㉖ 金錫亨、金熙一、孫英鍾：〈關於《世界通史》(蘇聯科學院編)有關朝鮮的敘述的嚴重錯誤〉，《歷史研究》，1963年第5期，頁21-24。
- ㉗ 〈人民出版社來函〉。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關於〈中國史稿〉的資料》(內部資料)，無頁碼。
- ㉘ 王輯五編：《亞洲各國史綱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頁53。
- ㉙ 李啟烈：〈關於朝鮮史的若干問題——評王輯五著「亞洲各國史綱要」朝鮮部分〉，《歷史研究》，1958年第11期，頁32-33。
- ㉚⑳ 〈劉大年覆函底稿〉。引自《關於〈中國史稿〉的資料》，無頁碼。
- ㉛ 〈人民出版社覆函〉(1963年12月17日)。引自《關於〈中國史稿〉的資料》，無頁碼。
- ㉜ 劉大年主編：《中國史稿》，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98。
- ㉝ 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上的講話〉，載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84。
- ㉞ 詳參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364、365。
- ㉟ 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人民日報》，1948年11月7日。
- ㊱ 有學者認為，蘇聯當時也面臨類似問題而發明了「愛國主義」的概念，以這個褒義詞來替代「民族主義」。參見郭樹勇：〈民族主義、國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思想〉，《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12期，頁70-71。
- ㊲ 吳玉章：〈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大公報·史學周刊》，1951年9月28日。
- ㊳ 戴逸發言記錄，《劉大年來往書信選》出版座談會，2007年3月13日。
- ㊴ 劉大年：〈論康熙〉，《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頁7。
- ㊵ 李澤厚、陳明：《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2001年對談錄》(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285。
- ㊶ 范文瀾：〈中華民族的發展〉，《學習》，1950年第3卷第1期，頁47。
- ㊷ 〈關於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等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新建設》，1962年第1期，頁58。
- ㊸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964-65。
- ㊹ 蔣大椿編著：《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2)；王學典：《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 ㊺ 程兆奇：〈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幾個問題〉，載徐秀麗主編：《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45。